

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些 新成果和新动态

(民主革命部分)

杭州大学王学启教授学术报告讲稿

开封市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一九八六年七月

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些 新成果和新动态

各位同志：

你们好！

开封市中共党史学会和河南大学联合邀请我来汴讲学，我十分高兴。对于各位领导和学会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来约定在今年春季来开封，后来因为工作太忙，推迟到今天。在这里，向大家致以歉意。

我报告的题目是《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和新动态》（民主革命部分）。报告的材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审稿会议，邀请北京和各地的党史专家、学者50多人，讨论他们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送审本）。胡乔木、胡绳、廖盖隆、李新等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大家对送审本作出较高的评价，认为它达到了国内的最高水平，在质量上超过了目前已经出版发行的任何党史本子。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是当前党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同时，大家也认为，送审本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也包含着不少新观点和新材料，是当前党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有幸被邀请参加这次审稿会议，聆听了胡乔木、胡绳等同志的讲话，认真阅读了高水平的送审本，并参加了讨论，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收获很大。我想

乘此机会向同志们作一简要介绍，共享党史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二）近一、二年来，党史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又取得了一些进展，成果累累。我给党史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叫着《党史研究信息》，定期向他们介绍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以便及时了解党史研究的信息。这对于开拓思路，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开这门课，平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整理成文。今年春天，我已向研究生讲了上述题目，现在我也想乘此机会向同志们交流一下，互通情报。

我的报告主要是客观地介绍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同时也阐明自己的观点。既谈别人的，也谈自己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即五个时期：五四动运、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讲50个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讲这么多的问题，只能扼要地加以评述，不可能详细展开。有的同志要求我，同时谈谈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恐怕这次来不及了以后再说吧。

我报告的目的，主要是想交流信息，开阔眼界，启发思考，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学术研究。我的水平有限，加上对报告的题目所作的研究也很肤浅，缺点和错误肯定是不不少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五四运动时期

一、关于五四时期“三次论战”的提法

过去，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者同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同张东荪、梁启超伪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区声白、黄凌霜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称为“三次论战”，并且把这三次论战一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送审本没有采取“三次论战”的提法和写法，而是分两方面论述：一是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胡适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梁启超的伪社会主义）；二是反对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

我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合适。因为胡适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张东荪、梁启超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公开鼓吹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这两派的政治主张，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则与此不同。他们在战略目标方面，是同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等等，则是错误的。这种思潮就其性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错误思想，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思想。总之，上述两种类型的思潮，其阶级属性是不同的，一个是外部问题，一个是内部问题；一个是反动的，一个是错误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笼统地斥之为“反动思想”。

二、李大钊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异常活跃。随着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传统的观点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李大钊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过去传统的说法是：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和《庶民的胜利》两文，就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一传统观点至今只有少部分人坚持，但大多数人不赞成了。

何时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目前有几种说法：

（一）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我国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论文，表明李大钊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应以此文作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二）1919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只是表明李大钊刚刚成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坚信唯物史观关于经济现象有决定意义的观点，相信阶级斗争的法则是历史的规律，从而在 worldview 上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信；但另一方面，他当时对唯物史观的了解还是粗浅的，还不能准确地把握其各个概念及其相互间辩证的关系，在具体问题上，往往还容易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他这时的观念中，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成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唯一真理。”

（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李大钊才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李大钊在1919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一般”，对于一些基本观点的理解还不恰当，甚至还有种种误解，只是到了1921年建党的前夕，他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解决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开始自觉奋斗。所谓三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指：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识。三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认识。这三个“关键性问题”的解决，表明李大钊已同障碍

他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真正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四）直到1923年底才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提出：李大钊在1918年底就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长期被“进化论”和“互助论”的思想所缠绕，到1922年才批判与摒弃了“进化”观点；直到1923年底他才消除了“互助”思想的影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新观点的提出，表明人们的思想已大大解放，不再受任何个人迷信的影响了。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问题

关于“相结合”的提法，据查，首先是考茨基提出来的。后来列宁沿用这种说法，到斯大林时又具体发挥了这种思想。在中国，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胡乔木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在党史讲义和党史教学中被普遍使用，一时成为不可置议的结论。1971年7月1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这篇社论是张春桥在上海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草的。发表前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周恩来也亲自审阅过，并作了若干重要修改。这篇权威性的社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提法，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到198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时，中共中央

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改变了五十周年的提法，恢复了三十周年的提法，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采用了这一提法。

对于“相结合”问题，在国内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国外，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例如在苏联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仅仅是“在中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基础”。但也有的学者如A·H·卡尔图诺娃则倾向于中国史学界的观点，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开始于1920年下半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见《1925年至1927年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一文）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允许开展不同观点的争鸣。对于欧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来说，“相结合”的提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欧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的概括。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欧美国家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例如在俄国，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成立，其间经过了二十年的宣传教育，才组成了俄国共产党。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确是欧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但是，能否把这一公式套到中国来呢，说中国共产党也是“相结合”的产物。我认为这是比较勉强的。因为中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很少，工人运动不发达，文化水平又极端低下。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因此，在中国也是首先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等，并以这些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下半年和1921年初，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但是，如果同欧美国家比较，这一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宣传教育时间只有一年（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根据史料和回忆宣传和活动是很少的；开办了两个工人补习学校（邓中夏在长辛店办的学校和李启汉在上海沪西办的学校）；出版发行了三个工人刊物，即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成立了三个现代化的工会，即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举行了两次活动，即1920年和1921年五一劳动节的游行示威。

正是因为时间很短，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又不多，因而当时没有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所以在共产党成立时，大部分党员是知识分子。据查，当时只有一个工人党员，那就是当时武昌文华大学工友郑凯卿。1920年初，陈独秀到武汉讲学，他同陈进行了一些接触，事后又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参加了当时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我党第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

从上述我党成立的历史过程和党员成分来看，很难说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否可以这样说：欧美各国共产党产生的特点是先结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点是先成立后结合。1921年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罢工高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相结合”的运动，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工人成分的党员也大大增加了。我倾向于苏联学者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奠定了“相结合”的基础。

这样讲，会不会影响党的性质呢？不会的。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因素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提出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是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党成立时知识分子党员占多数，后来农民党员又占多数，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我党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总之，党的性质不决定于是否“相结合”，而决定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纲领。这一点在产业落后的国家里看得更加明显。

四、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夸大长沙小组的作用，说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把长沙小组凌架于其他小组之上，甚至抹煞对建党起了主要作用的上海小组。这是个人崇拜在党史上的反映，歪曲了历史真象。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泛滥一时。二是贬低长沙小组的作用，甚至否认长沙小组的存在。有的同志说，长沙只有些建党活动，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是以团员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一大”的。在一个时期内，大学讲堂、党史书籍、报刊文章，都不提长沙小组了。

送审本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认为既不要无限夸大长沙小组的作用，也不要抹煞长沙小组的作用。送审本主要写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作用，但也写了毛泽东同蔡和森通信讨论建党问题；既写了上海、北京、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的建党活动，也写了长沙小组的活动。这样写法，比较实事求是，易为大家接受。

五、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问题

送审本指出在五四时期全国最闻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陈独秀，二是李大钊。恢复了过去“南陈北李”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在五四时期，贡献最大的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他发动了有伟大历史功勋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在“七大”时的评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是他被选为总书记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把陈独秀作为第一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写在党的历史上。

在五四时期，贡献最大的还有李大钊：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因此，应把李大钊作为第二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写在党的历史上。

如果把陈独秀和李大钊加以比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李大钊的贡献大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陈独秀的贡献大于李大钊。

送审本除突出了全国闻名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代表人物之外，还列举了各地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毛泽东、周

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董必武、蔡和森、赵世炎、彭湃等。这个名单是经过反复讨论拟定的。

六、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学者一贯强调共产国际的作用，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完全是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他们从来不提中国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并认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创建共产党的问题”。苏联许多学者从二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始终坚持这个观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港台学者，正是利用苏联学者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说中共的成立在国内没有社会基础，完全是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的，中共是所谓“移植党”，即共产国际把苏联共产党“移植”到中国来，制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台湾当局还在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以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受苏联学者的影响很大，在评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也过多地强调共产国际的作用。似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开始酝酿成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六十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逐渐破裂，不再强调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建党方面的作用，并且这个领域还成为一个禁区，人们不再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了这个禁区，开始注意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并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但是，有些同志在研究的过程中又重犯了苏联学者的片面性错误，过多地强调共产国际的作用，忽视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这样写法，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宣传

了“外因决定论”。近年来，党史工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工作。这些考证表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已经在商谈建党问题，即使共产国际代表不来华，按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也会建立起共产党，只是时间可能迟一些。

送审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采取了新的写法。即“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写起，同时肯定共产国际的帮助。不采取从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帮助建党写起的写法”，正确处理了外因和内因的关系。

七、关于几个问题的评价

(一)关于“一大”的党纲问题。送审本指出当时“一大”已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及其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一大”又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则是错误的；在策略问题上也有不正确的提法，如排斥、攻击一切政党，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对“一大”纲领作了一分为二的评论。

(二)关于“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送审本指出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选择，对于幼年时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强调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共要绝对服从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一切决议，这就给中国革命带来复杂的后果。这些提法加深了我们对于加入国际的认识。

(三)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问题。五四时期提出这个口号，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牢笼是

有积极意义的，应加以肯定。但是，这一口号又否定一切，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对于孔子及其学说，要一分为二。扬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近年来已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出版和发行了研究孔子的专刊，对孔子重新进行了评价。

八、二则史实

（一）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身份问题。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其主要依据是我国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最近，有的同志提出，根据苏联学者提供的历史文献材料来看，上述说法值得商榷。苏联材料说明：1920年4月，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是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分局派出的。维经斯基来华期间，一直是在俄共（布）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据此，苏联学者认为维经斯基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是俄共的代表。

（二）关于“六三”罢工问题。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罢工的？有些同志以为是从“六三”开始的。这可能是误解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一段话：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所谓“六三运动”是指：1919年6月3日上午，北京各校学生两千多人走向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结果，遭到北京政府军警的镇压，大约有170人被捕。这就是“六三”事件。

6月4日下午7时，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了上海。

6月5日，上海开始举行“三罢”斗争，即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由上可知，所谓“六三运动”不是“六三罢工”的意思，上海工人是在6月5日开始罢工的。毛泽东所说的“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后期的统称，不是说6月3日上海发生过罢工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一、1923年1月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问题

送审本对于这个决议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指出它有正确的方面，并占主导地位。例如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等等。另一方面又指出它有错误的方面，例如只看到国民党内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而没有看到还存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南方军阀官僚的代表人物；只强调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团体，而忽视了它的妥协性（两面性问题）；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共产党的力量，等等。这些片面的错误看法，便成为后来党内发生忽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思想的先导。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有严重右倾错误的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看来与这个决议有联系，或许是陈独秀右倾思想的来源之一。

二、1923年9月瞿秋白发表的《自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

送审本对这篇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指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的基本原理，并初步运用这些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它在国民革命中将“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因此，这篇文章是党内最早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当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而与陈独秀的主张相对立的论文之一。过去有人说邓中夏是党内最早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人，主要依据是1923年12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论工人运动》一文。瞿秋白上述文章比邓中夏早三个月。

三、五卅运动是由谁领导的

1985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探讨了究竟是谁领导了五卅运动的问题。有三种意见：

（一）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虽然当时有些活动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但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起作用。上海、江苏、武汉、天津等省市国民党党部的情况，就是如此。

（二）也有人认为五卅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也不能低估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国民党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省港大罢工中，则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三)还有人认为,五卅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应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各自发布的一些文件和大的活动排列起来,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材料。

在第一种意见中,即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究竟“谁是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1985年第1期《档案与历史》上发表了《评析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作者认为,伟大的五卅运动是由中共中央集体领导的。中共中央既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那么,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理所当然的应是五卅运动的“总司令”或主要领导人。他认为,过去的两种传统说法是不确切的,应加以订正。

一是认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蔡和森”是主要领导人。说他在关键时刻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领导了五卅运动。这个说法难以成立。当时蔡和森是常驻中央局的中央委员,主编《向导》周报,鼓动群众反帝斗争甚力,对五卅运动的兴起是有很大贡献的。但蔡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即因病离沪赴北京西山疗养,没有继续参加运动的领导工作。所以把蔡说成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是认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是主要领导人。说他自始至终指挥了这一空前伟大的反帝斗争。这个说法也难以成立。因为刘少奇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他的职务是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他在五卅爆发后来上海,和李立三等一起领导了上海二十多万人的总同盟罢工,对五卅运动的胜利开展和长期坚持有很大功劳,但

把他说成全局的主要指挥者，则显然属于夸大。

作者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整个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一直坐镇上海，居中指挥。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选出九名中央委员，其中五名常驻中央局（上海），即陈独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以上两人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工农部主任）。这五人的情况是：五卅运动前两个月，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住进宝隆医院，到中秋节前才出院。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离沪去北京，10月间返沪随即去苏联。所以留在中央局领导五卅运动的只有三个人：陈独秀统筹全局；瞿秋白负责宣传工作，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分管工人运动。

在中共中央之下，各条战线负责人的情况是：领导工人运动的有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等人；领导学生运动的有恽代英、李求实等人；领导妇女运动的有向警予、杨之华、张琴秋等人；领导教职员运动的有沈雁冰、杨贤江、侯绍裘等人；还有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庄文恭等人。

这些同志遇事集体商量，会后分工负责，而主其事者则为陈独秀。

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的工作是很繁忙的。他在党中央起了决策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主持党中央会议，决定方针政策，起草或审定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指导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反帝运动。此外，还有大量的日常工作等待他处理。

（二）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据沈雁冰回忆：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主持党中央的紧